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文』的再认：

章太炎文论初探

陈雪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
文化 与 诗 学



『文』的再认：

章太炎文论初探

陈雪虎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的再认:章太炎文论初探/陈雪虎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7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文化与诗学)
ISBN 978-7-301-14019-2

I. 文… II. 陈… III. 章太炎(1869—1936)—文学研究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7819 号

书 名:“文”的再认:章太炎文论初探

著作责任者:陈雪虎 著

责任编辑:吴 敏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4019-2/I·2049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三河市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22.75 印张 350 千字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

世间万事万物都在变化着、发展着。我们研究着的专业——文学理论——也是如此。回想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对“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一“宪法性”口号产生了极大的反感,急于摆脱文艺的“他律”的束缚。我们开始热衷于文学的审美特性的研究,热衷于主体性的研究,随后又开始热衷于文学语言的研究,“自律”的研究成为时尚。可以说在文学理论这个园地里先后出现了“审美论转向”、“主体性转向”和“语言论转向”。实际上当我们实现这种“转向”之时或之前,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界,则开始了另一种“转向”,那就是文学研究的“文化”视野的勃兴。西方文论向文化视野转移,有其自身的原因。资本主义越是发展到晚期,自身的社会问题就越多。如种族冲突、阶级冲突、性别冲突、东方与西方的冲突、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工业化与自然的冲突等等,都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严重问题。人们已经对兴起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新批评”和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文论感到不满足,因为他们主张文本绝对“自律”,以隔绝的眼光关注文本自身,就艺术谈艺术,就形式谈形式,完全脱离社会与现实,使读者无法从他们的笔下看到时代的面影和现实中的紧迫问题。阅读文学的大众,绝大多数总是关怀现实的。文学大众对“文本自足”的批评感到厌烦,他们要求有一种切中时弊的批评模式。这样就有一些理论批评家要超越“新批评”和结构主义,重新重视文学的“他律”性,他们强调文学艺术处于某种文化关系中,强调文学艺术作品不论如何“独立”,都不可能与社会文化毫无关系。相反,他们认为文学作品中有丰厚的文化意义,文学艺术作品不能不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视野的文学研究逐渐成“气候”,各种“主义”应运而生:针对种族身份认同问题,出现了“东方主义”批评;针对性别对立问题,出现了

“女权主义”批评;针对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的冲突出现了“后殖民主义”批评;针对文本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出现了“新历史主义”……这种文化研究发展到极端,甚至提出了文学研究中的“反诗意”的观点。当西方兴起这些浪潮的时候,我们的理论界正在进行“审美”的狂欢、“主体”的狂欢和“语言”的狂欢,直到20世纪末,我们才发现我们又“落伍”了,要求走出“审美城”,呼吁建立中国的“文化研究”,“艺术文化学”或“文化诗学”的要求也被提出来了。

但是我认为,我们今天提出文学的文化研究,并不是在西方的面前“落伍”的问题。文学的文化研究的根源在中国自身的现实。近二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行,人民的物质生活有了很大的提高,社会出现了不少可喜的新变化,故步自封的局面被打破,思想解放冲破了许多原本是封建刻板的条条框框。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毋庸讳言的,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行,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文化问题。总起来看,主要是“拜物主义”、“拜金主义”、“商业主义”等。“物”、“金”、“商业”都是好东西,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是我们追求的东西,但是一旦“惟”这些东西为主臬,为上帝,为神明,那么物欲、金钱欲、情欲、交换欲等人的生物性欲望就主宰了人的精神世界,人文理想就受到了侵蚀、压迫和消解,道德水准下降,腐败现象蔓延。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和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文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中一味宣扬上述种种生物性欲望的作品表示不满,对于一味玩弄语言形式的作品不满,对于没有血性的、没有爱憎的、没有鲜明文化价值取向的作品不满,要求理论批评家不能不关心现实。同时也不满过分专注于作品形式的“内部研究”和过分关注于诗情画意的审美批评,希望文学研究和批评更多地触及社会现实问题,并回答人的生存境遇问题,例如,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关系问题、都市与乡村问题、东西部问题、廉政问题、弱势群体问题、古今问题、中西问题、性别问题、大众文化问题、文本的价值阅读问题……不但如此,而且在解读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也要放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和分析,揭示其真实的文化蕴涵,以便帮助今人了解古人和外国人是如何来解答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文化问题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文学理论学科中强调文化视角和文化语境,乃是根植于我们自身现实的土壤中,并非完全从外国搬过来的。

文学理论学科要发展,就不能不随着时代的要求做出新的应对。目前开始受到重视的文化研究,对文学理论学科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文化研究的所谓跨学科反学科的方法,可能冲垮原有的文学理论学科的知识体系,过分政治化的话语,过分“社会学”化的话语,也可能重新让文学理论面临“为政治服务”的痛苦记忆,面临学科体系受到冲击的危险,这不能不说是文学理论面临的挑战。但是,文化研究如果不一味滑向所谓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研究,不一味坚持其二元对立的僵硬的方法,那么由于文化研究跨学科的开阔视野和关怀现实的品格,也可以扩大文学理论研究的领域,密切与社会现实的关系,使文学理论焕发出又一届青春,使文学理论原有格局发生变化,这难道不是一个发展自己的绝好的机遇吗?

西方流行的文化研究中带有真理性的观点和做法,如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方法,重视文学艺术与语言、神话、宗教、历史、科学关系的研究,我们可以有分析地加以借鉴。世界上一切好的又是适用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拿过来,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但我们有我们自身的社会现实问题,我们要从我们的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文化研究应该走自己的路。对于西方那种过分政治化的文化研究,对于“反诗意”的文化研究,我们认为不足取的。我们大可不必走西方那种以一种方法取代另一种方法的路子。文学理论的建设应该是累积性的,如“文革”前几十年来积累起来的社会历史批评经验,在经历过“文革”的教训之后,在新时期开始那些年代所取得的关于文学审美特性的成果,关于文学语言特征的成果,还有其他一些成果,只要是好的,具有真理性的,不但要继承下来,而且要继续研究下去。在审美、主体、语言和其他方面,仍然有发展的广阔的空间。

对于文学的文化研究来说,文学的诗情画意是其生命的魅力所在,怎么能把“诗意”“反”掉呢?我们仍然坚持,文学批评的第一要务是确定对象美学上的优点,如果对象经不住美学的检验的话,就不值得进行历史文化的批评了。文学是诗情画意的,但我们又说文学是文化的。诗情画意的文学本身包含了神话、宗教、历史、科学、伦理、道德、政治、哲学等文化含蕴。在优秀的文学作品中,诗情画意与文化含蕴是融为一体的,不能分离的。中国的文化研究应该而且可以放开视野,从文学的诗情画意和文化含蕴的结合部来开拓文学理论的园地。这样,“文化诗学”就不能不是文学理论发展的一

个重要趋势。

“文化诗学”仍然是“诗学”(广义的),保持和发展审美的批评是必要的;但又是文化的,从跨学科的文化视野,把所谓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贯通起来,通过对文学文本的分析,广泛而深入地接触和联系现实仍然是发展文学理论批评的重要机遇。“文化诗学”将有广阔的学术前景。

我们不必照搬西方的文化研究。外国的文化研究与我们的文化研究究竟有什么异同?一般认为,国外的文化研究是从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开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主要特色是一种政治批判,认为资本主义到了晚期,早期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已经被文化的渗透所代替,是让人异化,舒舒服服地变成奴隶,成了奴隶还感觉不到。文化研究就是这样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它关键的词语是种族问题和东方主义、性别问题和女性主义、地域问题和社群主义、阶级问题和社会主义、古今问题和新历史主义等。其研究是从西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出发,而选取了这样一些话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批批的文艺学流派。我们的文化研究则要走自己的路,或者说要按照中国自身的文化实际来确定我们自身的文化诗学的思路。

我现在所想到的是,文化诗学研究就其基本原则说可以有五点:

第一是历史优先原则。文化语境的研究,不论我们是研究现代的文学问题还是古代的文学问题,都必须把问题放置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尽管绝对真实的历史文化背景往往难以追寻,但是无论如何难,我们还是自觉地去做。过去我们的研究也常这样做,但我们常常不够自觉。更多的时候,就理论问题谈理论问题,注意的是观点和形式逻辑,所以别的专业的人士常说我们搞理论的人所写的文章比较空。文化诗学应该自觉改变这种状况,使我们讨论的问题进入历史、社会、文化语境,在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所讨论问题的针对性自然会凸现出来,自然会摆脱那种脱离现实的状况。

第二是对话原则。无论是研究作家作品,还是研究前人的文学理论,都是对于作家、作品或原有理论家、理论作品的一种阐释。这种阐释不是独语,而是一种对话。我一直主张古今要对话,古和今是两个主体,要进行对话,要把古代的东西激活,然后进行对话。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其次是中西的问题。与古今问题一样,哪些可以全球化,哪些不可以全球化。实际上

这也是文化研究中很热的一个问题,这里面问题很多。我认为,中西问题是一个对话和共享的问题。另外,作为研究者的我们与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家或理论家的一种对话。对话要真正的平等才能深入地展开。就像我们在朋友之间的交谈,一定要平等相待,充分地恳切和真诚,彼此才能敞开心扉,通过交谈,做到双方都受到教益。我们在对作家(作品)、理论家(理论著作)的研究中也应该是如此。把对象也当成一个值得尊崇的主体,想尽一切办法激活它,让它似乎也真的成为一个鲜活的主体,能够袒露自己的真意;而作为研究者也自然是一个主体,能以商榷的态度,而不是以强加于人的态度,与对象实现真实的对话。只有在这种对话中,研究才是比较客观的和可靠的,而不是主观的、随意的。

第三是自洽原则。文化诗学的研究,应该是圆融的,能够自圆其说的。例如其中的阐释、比较,不能自相矛盾或前后矛盾,应该在观点和方法上一以贯之,逻辑上能自洽而圆通。你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新的解释和新的比较,但必须合情合理。所有片面的论述,其中弱点之一,就是不能逻辑自洽。

第四是联系现实问题原则。学术研究完全可以为学术而学术。学术的独立性是应该受到尊重的。这一点早在上个世纪初的杰出学者王国维就讲得很清楚。但文化诗学的思路则如上面所述,应该从现实问题出发,通过研究,提炼出某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来。这种文化精神或诗性精神正好是现实所缺失的东西,因此我们通过文化诗学所获得的成果可以弥补现实的不足,是对现实的一种回馈。当然,我们的研究可能不是对现实社会文化问题的正面研究,不可能像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研究那样正面解决社会问题。但我们从诗学的视野出发的研究,可以以间接方式回应社会,不也很好吗!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累积的问题很多。文化诗学应该有问题意识,我们中国有自己的国情,我们的文化研究应该找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无论如何不可放弃对诗意的追求。文化视角无论如何不要摒弃诗意视角。我们要文化,但也要诗意、语言等等。大可不必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是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的守望者。

存质求真与整体文化的重建

童庆炳

陈雪虎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选择了章太炎的文论问题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当时我很佩服他的勇气,因为章太炎是大学问家,可文章古奥难懂,连读起来都不容易,而要进入章太炎的学术世界,对他的学术进行研究,那就更难了。但在佩服的同时,也为雪虎担忧,怕他做到中途做不下去,花了许多宝贵的时间,最后无功而返。我的担忧是多余的。雪虎以他的学术勇气和坚持精神,硬是做完了,而且做得很好。论文经过几年的修改后,资料更扎实,思路更清晰,新意更突出,成为一篇优秀的论文,作为他的老师和同事我真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章太炎在近代历史上,他是一位革命家,为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为了推翻清王朝的统治,真是豁出命去干。章太炎系狱三年,从事苦役,备尝艰辛,表现了一位革命志士终不屈不挠的精神。民国成立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暗杀宋教仁,血腥镇压二次革命,章太炎只身赴京,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骂袁世凯包藏祸心,被袁世凯派兵软禁。但是就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执著于学问,刻苦著述,形成独具一格的具有革命性的系统文化思想。以他为首的“章黄学派”至今仍然是语言学界一大学派。鲁迅称其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并非过誉之词。

雪虎这篇论文专门讨论他的文学思想。在近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在为国家民族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其中学习西方几乎是人们不约而同的选择。章太炎曾在日本滞留很长时间,对于西学也是精通的。雪虎的论文中有详细的说明。但章太炎最终没有选择西学,而是看重朴学、小学。他对文学的理解也与别人有很大不同,他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

文学。凡文理、文字、文辞,皆言文。言其采色发扬谓之彪;以作乐有阙,施之笔札谓之章。《说文》云:‘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彪,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彪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彪,是故樵论文学,以文字为准,不以彪彰为准。”对此,雪虎分析说:“很显然,在当代,文学观念往往是以西方美学和审美主体学说为基本内涵,而章氏所论与我们今日所想大有不同。‘美’、‘美感’、‘彪彰’、‘语言’都不能等同于‘文’,只有‘文字’才能作为区别衡量‘文’的特征和标准。就上所引,至少有三个要点值得注意:首先,在他看来,华夏之文,源远流长,变化甚多,界说‘文’和划分文体都必须追溯源流,从训诂文义着手,否则就不能作出合乎中国实际的理论概括。其次,与旧时文人一般以文章来指代‘文’的思路不同,章氏认定‘夫命其形质曰文,状其华美曰彪,指其起止曰章,道其素绚曰彰,凡彪者必皆成文;凡成文者不皆彪’,文章事实上是指有形质而自成首尾的篇制,‘彪彰’只是特指那些富于文采、藻饰和情韵的文章,其范围很小,只是‘文’的一小部分,不能以局部代替整体。界定‘文’不能以文采和情韵为标准,而在抓住‘文’的基本质素和规定性。”这一分析很到位,问题是章太炎为什么要把文学界说为“文字文化”,而并不喜欢富有文彩、藻饰一类的“彪彰”?与此相联系,他为什么主张“文学复古”?这种对文学的理解和文学主张是具有革命性的吗?雪虎的论文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说:“章太炎所理解的‘复古’,并不是要回到古代,而是企图通过复兴古学,以实现‘文学复古’。也就是说,扫除唐宋以降的文学文化的垃圾,在周秦诸子六朝文章等古代文艺遗产中努力挖掘;继承先民生机勃勃锐意创造的精神,树立民族自信心;发扬民族创造力,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新的文化与艺术。”的确,当时我们的民族在帝国主义的入侵下,受尽欺凌,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遭受沉重的打击,因此,借“继承先民生机勃勃锐意创造的精神”以激励自己是很重要的。这应该是当时求民族独立的一条思路。那么为何那么重视文字,说“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这难道真有革命意义吗?在章太炎看来,他的这种理论,正如雪虎所言:“其实是突现对文化的‘征实’‘存质’这些基本素质的追求。正是从并非‘文饰’的‘文字’观出发,通过对无句读文的记录性、符号性和直接性的强调,章太炎使传统文学观中的‘文’‘质’对立的观念得到了反正和澄清。

‘文’的‘质’性在章太炎强调实用性的公文和考据学的疏证文体而得到强调，唐宋以后才子文人们富于感觉和表象的文风和以‘文采’和‘文辞’为文的观念，遭到了章太炎的严厉批判。”当然，影响清代文风的“桐城派”的所谓“义法”，更在他的批判之列。他的文学观强调要正确而富于创造性地运用民族语文和文体，书契记事，表情达意。由此他讲所谓“宁为求真，不为径便”，甚至自命“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这些都突出地体现了辛亥革命时代里章太炎独具特色的科学“求真”的革命意志和文化重建的理想。可以这样说，在文学的真善美三者中，他更珍视“真”，这与鲁迅反对“瞒和骗”有相似之点。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太炎的文论诚如雪虎所言对于冲破封建思想罗网、重新塑造民族文化是具有革命意义，当然也就具有现代性。

这样一来，章太炎的文论又面临一个问题，这种以“文字”为基准的文学观，是否能为普通的人民群众所用呢？雪虎对此又有何见解呢？他在论文中用第二章来回答这个问题。原来在章太炎文论内部，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独特的文学“雅俗”观。章太炎在庄子的“齐物论”思想的启发下，平等看待雅言和俗语，力图平抑现代“求真”和近世“通俗”之间的紧张。雪虎认为，这种观念其实是“吁求民族文学与文化复归历史和现实，民族语文遵循各自轨道，分别为偏于理性追求真理的士君子和偏于朴素追求生活基本面的民众服务，从而推进雅俗文化互生共进，逐步建设成一种有活力、有创造性的整体文化。”“所谓‘齐雅俗’，就是从整体文化的高度上，以雅俗概念区隔‘雅化’和‘随俗’两大并行不悖的文化系统，并由此形成更具包容力的文化的‘齐雅俗’理念。由于采取历史化、整体化的文化视野，章太炎能够把文化总体一分为二，分成雅文化（以雅化为主体追求）与俗文化（以随俗为主要特色）两大系统，并且力求平视‘雅’‘俗’。‘齐雅俗’的思路是在章太炎的‘齐物’论的意义上展开的。正是在这种表彰多元文化的‘齐物’论的思想中，才出现了在一种整体文化格局中‘齐雅俗’的可能和进路。在这一思路中，‘俗’意味着具体而多元的天下万物中的一种必然状态，它是‘草生万民’作为世界之一物而自然土长、自生自灭而又内在具有其‘自性’的生活状态和生活样式。这是包括口头文化或通俗文化或下层文化或民间文化等在内的、人民的生活实践的文化。”雪虎此论，深得章太炎文论精髓。这

样一来,在章太炎的文学观念中也就有了人民群众的位置。

雪虎面对章太炎这个对象,难度可想而知。但他战胜了困难,而获得了成功。雪虎知识面宽,学风严谨,对于文献资料的整理尤能下功夫,因此他的论文实证性强,在合理的理论框架下,完全用事实说话,这是他的论文的特点,也是难得的优点。

雪虎还这样年轻,他的面前展现出一条又长又广的路。我希望他能在这条学术的道路上,奋斗不息,勇往直前,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为祖国的学术事业作出贡献。

2007年11月28日

被搁置的现代性景观

王一川

谈论我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不能不上溯到晚清。正是在那古典衰落而现代学术勃兴的转折时段,可以发现现代文学思想的种种发生学讯息和代码。怀抱这意图而回溯晚清的人们,完全有理由聚焦于梁启超与王国维这两大开创性人物,从中发现文学功利主义思想与审美主义思想的萌芽。然而,陈雪虎博士的这部博士论文偏偏选择了另外一位复杂和矛盾的焦点人物去研究,这就是一向被视为古典文学思想的末世拯救者而非现代文学思想源头的、既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鲁迅语)却又竭力主张“文学复古”的章太炎。拿一个集政治“革命”与文学“复古”这对矛盾于一身的争议性人物来研究,确实需要特别的勇气和胆识。我以为这一直面矛盾的工作是有价值的。由于章太炎文论及其思想不仅在辛亥革命时期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对五四时期的文学思想有着内在地启发和支持的作用,因而这一研究有助于厘清现代文论的发生学状况。

雪虎果断地走出前人研究中简单的“文学复古”论漩涡,重新构建起清末民初文化语境和文论格局,由此给章太炎及其“文学复古”论予以重新正名。他指出,章太炎的文论是一种远比今天的文学理论意义上的文论更为宽泛的文论,其基础是章太炎的语文现代性的文化重建思路。这里的语文现代性,是立足于民族文化发展的主体性而展开的现代汉语文体和语文等的建设过程,其主要着眼点在于文体和语文。对革命家章太炎来说,正确而富于创造性地运用民族语文去表情达意,追求“宁为求真,不为径便”的境界,正是语文现代性的核心。这就成功地把那个时代里章太炎的独具特色的科学“求真”的革命意志和文化重建激情重新描摹出来。

雪虎在研究中发现,在章太炎文论的内部存在着一种等视雅俗的理念。

这是颇有见地的。这就是说,章太炎的文论带有一种“齐物论”思想,受此启发,他倾向于平等地看待雅言和俗语,并且力求平抑现代“求真”和近世“通俗”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章太炎看来,现代新的民族语文应当努力在文化上层与下层间遵循各自的既定轨道运行,分别为偏于理性而追求真理的士君子 and 偏于朴素而追求日常生活的民众服务,由此推进雅俗文化的共生与互进。应当说,揭示章太炎的这一等视雅俗的观念是很有用处的,有助于认识他的文论的内在矛盾的症结所在。我以为,章太炎完全有理由主张等视雅俗,因为后来的文坛发展证明,雅俗分立及各行其道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不过,这不能掩盖他的致命“失误”:不选择创造新的现代汉语而回到“复古”的老道。也就是说,他并非对新的全球化力量缺乏切身感受,也并非简单地敌视现代性进程,而只是“错误”地选择了不合时宜的“复古”之道去试图看护新的现代生活体验或现代性体验。

这部书还注意勾勒章太炎对后世文论的影响线索。第四章梳理了“五四”时期胡适和钱玄同的文论,论述他们如何从章太炎文论的“言文一致”思想中汲取启感,推进白话文运动。这就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章太炎对“五四”的影响。第五章进而考察“五四”前鲁迅和周作人在精神和思想上同乃师章太炎之间的联系,点明了周氏兄弟一生坚持的直译思想与章太炎文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就对鲁迅的翻译理念的生成提出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说到底,这部书包藏了一个颇有雄心的意图:在晚清文学思想格局中给章太炎文论和文学思想挣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是:作为现代思想家,章太炎的文学思想自成体系,涌动着“求真”“存质”的、理性而又革命的激情,同时又试图平抑现代“求真”和近世“通俗”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思想在辛亥时期及“五四”时期发挥着独到而深刻的影响。应当说,这一意图无可厚非,而这种探究也值得鼓励。

不过,在肯定这种探究意图的同时,我觉得更应当分辨的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如何来历史地评价章太炎文论的这种地位。这时,我发现章太炎当年无法不面对一种深刻的历史尴尬:他的“文学复古”方案如果置身在中国现代文化的一种渐变语境中,是应当有理由走向成功或部分成功的,因为渐变语境有可能促成有意识的、以“文学复古”为特征的现代性方略取得成

功;然而,当这种方案确确实实地被抛入一种相反的激变或巨变语境里时,就只能面临被搁置的命运了,因为飞速奔泻的现代性激流来不及留驻水土不服的复古方案。对于章太炎的这种历史性尴尬,今天更应该有着清醒的觉察。但这样说并不等于可以无视章太炎文论的特殊历史价值:面对新的生活体验而试图回溯语文传统,这在今天也仍然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历史选择。在这方面,章太炎的“文学复古”方案的“革命”性仍旧值得重视。甚至他的重“复古”而轻创造的语文现代性方案,至今也仍旧是我们的语文现代性路途上的一片被搁置的耀眼景观。

远 in 多伦多大学访学的陈雪虎博士来函嘱我写序,于是写了以上的话。

目 录

《文艺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童庆炳(1)
存质求真与整体文化的重建	童庆炳(1)
被搁置的现代性景观	王一川(1)
导 论	(1)
一、章太炎其人其学	(2)
二、章太炎文论概述	(11)
三、对章氏文论研究的反思	(15)
附录:	
章太炎学术年谱简编	(22)
第一章 文学总略:“以文字为准”及其革命潜义	(35)
一、文字文化论及其学理渊源	(36)
1. “以文字为准”	(36)
2. 学理渊源与文化根基	(40)
二、“以文字为准”的逻辑性与现实性	(47)
1. 文字与“口说”对待	(48)
2. 文章与“彰彰”对待	(54)
3. 文章道统或审美学说	(60)
三、“雅言故训”的革命性潜义	(70)
1. 文字的本性:表象符号学	(70)
2. 技巧论批判:“以病质为美疾”	(74)
3. 革命的冲动:“斫雕为朴”与勇于“解剖”	(76)

附录:

1.《文学论略》	(81)
2.《国故论衡·文学总略》	(93)
第二章 雅俗之辨:真俗两间的现代紧张	(111)
一、雅俗之辨(上):作为文学评价	(112)
1. 雅俗者存乎轨则	(112)
2. 现实所指与理论内涵	(124)
二、雅俗之辨(下):作为文化区隔	(131)
1. “积极求雅”与“便俗致用”的张力	(131)
2. 历史考察及整体格局	(138)
三、真俗两间:现代化场景与章太炎	(149)
1. 雅俗分际的现实性	(150)
2. “齐雅俗”的意义	(155)

附录:

1.《国故论衡·论式》	(163)
2.《国故论衡·辨诗》	(174)
第三章 文学复古:语文现代性与文化重建	(196)
一、“提倡国粹”即保守?	(199)
二、“师法魏晋”即复古?	(206)
三、“复兴古学”即反动?	(213)
四、语文现代性:“取千年朽蠹之余,反之正则”	(224)
五、文化重建思路的地位与特色	(228)
1. 旧有格局:四种文论	(228)
2. 新变各家: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	(232)
3. 语文现代性与依自不依他	(239)

附录:

前五四时期文学暨文论年表简编(1898—1917)	(254)
第四章 章太炎与民族语文的现代转型	(266)
一、民族语文的危机及对策	(266)
二、语文现代性与“言文一致”理想	(273)